

藏族文学研究

བཟོ་སྐྱེལ་མཁོ་རྒྱུ་ལྟོས་ཀྱི་ལུ་སྐྱེལ་

佟锦华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藏族文学研究

བཟོ་སྐྱེའི་ལོ་རྒྱུས་ཀྱི་ཞིབ་རྒྱུ་

佟锦华著

83443

中国藏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8 号

责任编辑：宋月红

封面设计：王 志

版式设计：姜 宏

藏族文学研究

定价：精 9.50 元
平 6.10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人民卫生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26 千

199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精) 300 (平) 2700 册

ISBN 7—80057—067—3/I·1

作者简介

佟锦华，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1928年10月20日出生于山东莒县，曾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进修班、华东大学艺术系、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毕生从事于藏族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1989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有《藏族文学史》（任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藏族古典文学》、《藏族民间文学》、《藏族传统文化概述》、《藏族文学》等；发表有《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格萨尔王与历史人物的关系》等论文三十余篇；合作编译过《拔协》、《藏族民间故事选》、《藏族民歌选》、《藏族动物故事选》、《阿古顿巴故事集》、《藏族谚语》等多种藏族历史与文学读物；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哲学等卷、《哲学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辞典》、《传说辞典》、《敦煌学辞典》、《中国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婚姻家庭词典》等词书撰写词目多条。

生前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市少数民族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目 录

序言	1
文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	13
民族文学表现的道德观念	25
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35
——兼论编写藏族文学史应注意的基本原则	
论《巴协》	64
《金城公主的传说》、《灰栏记》与《檀腻鞞品》	86
评《萨迦格言》	97
藏族传记文学的一颗明珠	120
——《末拉日巴传》	
《玛尔巴传》评介	136
藏族古代作家诗的一眼清泉	146
——评《仓洋嘉措情歌》	
十八世纪西藏政治风云录	162
——论《颇罗鼎传》的主要思想内容	
《诗镜》的传入及其影响	176
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196
《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218
格萨尔王与历史人物的关系	254
——格萨尔王艺术形象的形成	

《格萨尔王传》的诗歌格律	282
《格萨尔》研究的新开拓	310
——评《〈格萨尔〉初探》一书	
藏族诗歌格律研究	325
藏族神话漫谈	385
藏族神话的特点与审美观	399
略谈藏剧	409
附录：佟锦华论文和著、编、译书目录	419
后记——忆锦华	424

序 言

—

也许是应了佛教讲的“机缘”罢：我与佟锦华先生是因藏族文学而结下了缘分。

那还是六十年代初期，锦华先生正在中央民族学院撰著和教授《藏族文学史》，而我则刚到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前身）从教不久，因为渴望了解和学习藏族文学遗产，有缘结识了锦华先生。论年龄，他大于我不足十岁；而论学识，他当时已是一位年轻学者，是我的先生。从此，二十多年来，我们之间，或书信往来，或促膝交谈，话题几乎都是关于藏族文学，旁及西藏各民族文学。我每每向他请教，或索取资料，他总是慷慨解怀，不余片私。

当我现在拜读由锦华先生的夫人黄布凡女士编选的《藏族文学研究》时，我的思绪翻腾，久久不能平静。这些论文虽早已成为我的案头书垒，但现在读来，别有一番感受凝聚心头。锦华先生去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祥和的谈话，再也读不到他的亲笔书信了；然而，他的精神永在。他一生矢志于藏族文学事业，他对藏族文学由衷的爱，依然撼动着我的心海。一方面，我再一次被他的这些论文的精辟而独到的见解紧紧吸引；另一方面，我也是再一次被他的这些论文所饱含的对藏族文学的情愫所深深激动。锦华先生是把他的一生的心血无私倾注在播扬

藏族文化的事业上。早在五十年代伊始，他毅然放弃山东大学的求学之机，转到中央民族学院，攻读藏族语言文学，一开始就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藏学领域。他亲自深入西藏考察，足迹印遍雪域的山山水水，一直步行到号称“高原孤岛”的墨脱。在这以后的若干年里，他又多次进藏，或考察，或研究，或参加学术讨论，都是为了播扬藏族文化。1984年，他已身患心脏病，还是抱病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五省区藏族民间艺人演唱格萨尔大会，病倒在高原，经抢救而脱险。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倒在他正在审阅的《藏族文学史》修订本的书稿上，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呕心沥血贡献一生的事业。

锦华先生认为，从事藏族文学研究，直接的对象是文学，而真正的对象是创造文学的民族和人民。他说，研究者不能把自己关在狭小的书斋里，而应该深入到创造文学的民族和人民中去，把自己和一个民族的广阔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要熟悉他们，热爱他们，这样，才能对民族文学有切实的感受和正确的理解，才能揭示民族文学的规律，作出正确评价。锦华先生是充满了对藏族人民真诚的爱和对藏族文化真诚的爱来进行藏族文学研究的。我们从他的卷帙浩繁的关于藏族文学的论著中，不仅看到了作为一位学者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而且感悟到了作为一位终生献身于藏族文化事业的人，灌注在字里行间的炽热的情流。锦华先生的这部藏族文学论集，就是他毕生心血和情感的结晶。

二

锦华先生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对藏族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的学者之一。

藏族文学，历史悠久，明珠璀璨，在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

长河中，异彩独放。“藏族文学，是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汗牛充栋的藏族作家文学名著，还是浩如烟海的藏族民间文学名篇，都是我国文坛上独具藏族风情和高原色彩的文学之花，也是世界文坛的一支奇葩。”（《藏族文学史·前言》，1985年。）如何科学地继承和研究藏族文学传统？如何揭示藏族文学的普遍规律？这个重大的课题，历史地落到了每一位藏族文学史论家的身上。锦华先生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最自觉的态度，接受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走上了研究藏族文学之路。我认为，锦华先生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就是：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对藏族文学的系统研究。他的全部论著，其中包括他的这部论文集，贯穿着一条闪光的思想红线，即对藏族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评价。他因此取得了丰硕成果，赢得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论家的荣誉。

文学，作为以语言为材料进行意识创造的物态化形式，作为人类以形象方式理性地认识和感应现实生活的形式，没有它自身的孤立无援的历史，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藏族文学是藏族社会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和变革，也是受藏族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关系制约的。锦华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系统观，历史唯物地分析论证藏族文学。他十分注重对藏族社会大文化背景的系统研究，他强调，藏族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是造成藏族文学历史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从宏观的总形势和大环境”出发去考察和论述藏族文学现象（《藏族古代作家文学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他是把藏族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历史，看作是贯通古今、流淌不息的文化大潮，而藏族文学，就是在历

史文化大潮中不断绽开的串串浪花；尽管浪花耀眼夺目，也离不开奔腾滚滚的大潮。这样，锦华先生的文学研究，便始终贯彻了社会系统论的观点。《藏族文学研究》，就是他宏观系统研究藏族文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如，他在对藏族神话《斯巴宰牛歌》与白族神话《开天辟地》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前者“造物主”形象“是一个高大的劳动牧民的形象，又是通过宰牛这种劳动方式来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一形象的民族特征是由藏族先民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决定的，它反映了藏族先民发展到畜牧业时代的思想认识。”（《文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关于《格萨尔王传》，锦华先生通过对它所描写的历史时代、社会状况和流布地域的考察，合乎逻辑地征得一个科学结论：“《格萨尔王传》正是以其如椽巨笔、宏伟的结构、壮阔的场面、高度的概括，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广大地区在这两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波澜起伏、风云激荡的社会历史发展、邦国兴衰更替和人间悲欢离合的戏剧。”（《〈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萨迦格言》一向被评论家誉为“心灵的镜子”、“语言的明珠”；而锦华先生则从历史宏观上论析，指出：“作者（贡呷坚参）所处正是西藏地区封建势力分裂割据、迭相雄长、民不聊生、人心思定的时代。”“贡呷坚参本人，不但是萨迦教派的首领，而且是昆氏家族在政治上有抱负的新兴农奴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著名学者，三位一体，名闻遐迩。他在格言诗中所阐明的为政治国之道，毫无疑问决定于他的这种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评〈萨迦格言〉》）。诸如此类的精辟论述，在这本《藏族文学研究》中，披文可见，反映了锦华先生文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不难看出，他面对藏族文学现象，常常进行历史的沉思，使他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双既是文艺评论家又是历史学家的慧眼。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恩格斯就曾反复强调，文学批评应

“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作家和作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7页）。恩格斯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就是坚持文学和社会历史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既要揭示文学的审美价值，又要把文学放到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评价。锦华先生在他的藏族文学研究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原则，使他为藏族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三

文学和宗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着在历史上曾以藏传佛教为主导体系的藏族文学，如何认识其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如何评价在宗教思想体系制导下的藏族古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美学价值？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研究又一重大课题，尤其不能回避。

在过去的探索中，人们习惯于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理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往往提出了迥异的理论和原则。历史上，在宗教家和宗教信徒们的眼里，只有宗教而没有文学。因为，在他们看来，震撼心灵、摇荡情性的语言是来自“神的气息”，是“神灵的凭附”。在“四人帮”猖獗和疯狂的年代里，“四人帮”也不过是一批现代宗教徒，他们一口咬定“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都是宗教迷信”，他们从另一个极端去否定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的存在。而某些虽是真诚的研究者，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多棱折射中，也往往只捕捉到、或只强调某一方面或某种特性。这样，在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面前，人们的认识往往有些迷惘。

在藏族古代文学研究中，锦华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深入地揭示了文学和宗教的复杂关系。首先，他明确指

出，宗教和文学艺术，都是矗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密切相联系的。“当我们分析研究文学现象及其发展历史时，必须分析和研究与之紧密相关的哲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他避免了把经济基础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之间的联系看作是直线的、形而上学的联系的抽象的推论，而是努力寻找藏族社会经济基础和民族文学之间的“中介环节”，这个“中介环节”就是藏族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宗教和哲学。藏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通过各个时代的政治、宗教和哲学的“中介”，而对藏族文学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阐释藏族文学和宗教关系的认识论基础。过去，有的文学研究者以为，只要熟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学“公式”，就可以说明一切文学现象。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锦华先生以他的卓越研究，与某些“荒诞无稽的空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次，锦华先生毫不隐讳藏族古代社会宗教思想体系对藏族古代文学思想体系的制导作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漫长的藏族古代社会，经历了原始宗教、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历史过程，宗教曾是藏族社会的精神支柱，形成了贯通古今的膜拜型文化体系，乃至在阶级社会中，成为统治阶级实行精神统治的武器。锦华先生精辟地指出：“文学艺术是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的形象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他追溯原始神话，“既是原始人类的原始文学艺术，又是人类的原始哲学思想，也是原始人类的道德观、历史学和神学等，是多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表现形

式。”（同上文）而进入阶级社会，“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锦华先生以令人敬佩的严肃、求实的态度，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宗教对文学制导作用的两面性：历史上的宗教，一方面给古代文学注入了宗教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思想内容，使文学成为宗教宣传的形象化工具；另一方面，宗教对古代作家群以及作家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品类多样化的产生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佛教僧人身兼文学家的现象，成为藏族古代作家文坛的一个突出特点。”“佛教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为藏族古代作家文学的出现与繁荣铺垫了丰富的文化素质的沃土，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个文学创作的群体。”（同上文）。他还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佛教僧人创作的文学的审美价值的二重性，即一方面使他们创作的作品“必然都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论证人世间是无边苦海”时，“他们便从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使他们的作品又获得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价值（同上文）。他深刻地指出：“藏族佛教僧人的文学作品不一定百分之百都是以佛教为主要内容，而非僧人的文学也不一定都是不以佛教为重要内容的”。所以，他反对用“僧侣文学”来概括佛教僧人创作的作品（同上文）。锦华先生关于宗教对文学影响的“两面性”和藏族古代作家文学审美价值“二重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事实上，离开现实的人对现实的感情和感受，就无所谓对现实审美的掌握，同时也无所谓对世界的宗教的态度。宗教不单在创造玄虚梦幻的形象和观念，同时也必然回到现实人生中去寻求虚幻形象的实用性证明，这就使宗教的幻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走向艺术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造，使宗教艺术获得了世俗精神，不仅使艺术的创造者（作家），而且使艺术的享

受者即膜拜仪式的参加者继续获得审美感受。锦华先生所论证的宗教对文学影响的“两面性”、古代文学的宗教功利性和艺术审美性的“二重性”，是对藏族文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因而也是他对藏族文学研究的创造性贡献。

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锦华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刻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者的勇气和对真理的执着精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后学者应该从他的研究中汲取的精神力量。

四

锦华先生对藏族古代文学的研究，始终服务于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启迪，服务于藏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尤其注重，通过藏族古代文学研究，加强汉藏友谊、民族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他的研究十分贴近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因而产生了广泛积极的社会影响。一位藏族评论家曾这样评价锦华先生：“他是属于我们的，他对藏族古代文学的研究，洋溢着现实生活气息。”

的确，锦华先生是用我们时代的头脑去思考古代问题，用现实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当然，他丝毫也没有为了现实功利去随意剪裁历史，为了“政治目的”去任意摆布古人。他非常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我们说他具有“时代的头脑”、“现实的眼光”，是指他从事藏族古代文学研究，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宏观俯视历史的风云变幻，着意揭示历史的普遍规律，从而引出必然的逻辑发展，总结发人深思的历史经验，从文学推及整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启迪今人和后来者。

锦华先生通过对《格萨尔王传》主题思想的研究，指出：

“当时的广大藏族人民都极端的厌恶战争，反对侵扰，盼望统一和平，向往安宁幸福生活。”“这些渴望，憧憬和向往带有普遍的、深刻的、根本的性质和意义，是藏族文学史上永不消竭的伟大主题。”（《〈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锦华先生在对《金城公主的传说》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史书未见关于金城公主生赤松德赞的记载，而为什么却有金城公主生赤松德赞的“传说”呢？他解释说：“应该承认，这种与事实正相反的传说的出现和艺术处理，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藏族人民对汉族人民的炽热友好的感情和希求与汉族“合同为一家”（见《赤松德赞上唐中宗书》）的殷切愿望，从而赋予这则“二妃争子”的传说以更为鲜明深刻的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思想内容和突出的民族的时代的特色。”（《〈金城公主的传说〉〈灰栏记〉与〈檀赋鞞品〉》）

锦华先生对《颇罗鼐传》的研究，着重剖析了这部传记文学的思想内容，热情歌颂民族英雄——颇罗鼐的高大形象，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西藏地方与清廷中央的密切关系，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事实，以及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大意义。”因而，它是历史名著，又是文学珍品。（《十八世纪西藏政治风云录》）。

我们从锦华先生的这些饱含激情的论述语言中，仿佛听到一位诗人对祖国统一、汉藏友谊和民族团结的赞美和讴歌。这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经验总结，也是真正“贴近生活”的科学论证。

锦华先生对古代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始终坚持以“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为标准。如他论证《米拉日巴传》：“总合起来，却共同构成一幅千家受苦、万民遭难的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为古代作家文学的优秀作品。”（《藏族传记文学中的一颗明珠——〈米拉日巴传〉》）。他对写作《萨迦格言》的萨班·贡珞圣参，“作为政治家、作为西藏地方政界代表人物与元朝协商，使西藏地方和平归顺元朝，从而对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所做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他“结合仓央嘉措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生平和特殊身份来加以分析和认识”，充分地肯定了“诗人的胸腔里，跳动着一颗与一般群众相同的心。”“诗人对坚贞爱情的赞扬和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的、正确的恋爱观，所以也能引起人民的共鸣。”仓央嘉措的《情歌》是“富于人民性的”。（《藏族作家诗歌的一眼清泉》）。我想，锦华先生对古代作家、作品所坚持的评价标准，对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创作，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不是也很有现实的意义吗？

五

锦华先生的这部《藏族文学研究》虽以文学为中心，但每个论题都辐射到藏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涉及到诸如历史、宗教、哲学、语言和民俗等多种学科，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科学成果。它的出版，无疑会给藏族文学研究以有益的启发和积极的促进。

也许，对锦华先生论文中的某些具体论断，并不一定会取得学人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我想，即使如此，也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科学研究，就是在怀疑和驳诘中前进。无数次的怀疑和驳诘，就会实现无数次的科学的超越。这是人类智慧不断前进的历史轨迹。因此，提出问题，引起思考，那怕并不完善，其本身也为科学做出了贡献。

历史在发展，文学在发展，研究也在发展。藏族文学研究，是一项不断发展、衍生和深化的系统工程，永无止境。后继者永远只能是踏着先驱者的双肩，向着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台阶攀登。后继者都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以巨大的支撑力驮负人们登高望远的先驱者的历史功绩。

于乃昌

1990年12月于咸阳